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时变特征

□齐红倩^{1,2} □席旭文² □高群媛²

(1.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2.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测算1996—2013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趋势,并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影响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资源与环境对城镇化发展表现出持续的抑制作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提升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效应,但2005年以后其促进效果逐渐弱化,特别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出现了明显减弱。我们认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约束下不宜过分高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应从智慧城市、节能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重点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关键词: 城镇化; 经济增长; 时变特征; TVP-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5)11—0026—09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然而,现阶段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国内外需求疲弱,资源、能源、环境约束趋紧,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新常态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目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城镇化被认为是下一阶段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1][2]}城镇化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而且可以有效集聚优势资源,催生新兴产业,释放出持续的供给潜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以土地和投资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效率低下、土地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对其自身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均形成制约^{[3][4]},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形成背离。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镇化发展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持续性如何,其作用效果和以往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是否存在差异,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如何适度推进城镇化等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关于城镇化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研究。从国际经验看,早在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Lampard^[5]就已指出,美国近百年来来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Chenery等(1975)^[6]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周一星(1982)^[7]根据人均产出和城镇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生产要素集聚与农民福利动态均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14BJL06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调整型经济增长对我国居民可持续性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13JJD790011);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2015020)

化水平对15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类回归,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呈正比例关系的结论。主要的相关文献还有Black和Hendersen(1999)、Henderson(2000)以及Bertinelli和Duncan(2004)的论文,他们均肯定了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8][9][10]}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也进行了针对性地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多数从总需求释放、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肯定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王小鲁(2002)^[11]从劳动力转移、城市规模优化及投资需求拉动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城市化可以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沈坤荣和蒋锐(2007)^[12]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可以通过带动人力资本与知识技术的积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个途径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丁学东(2009)^[13]、王刚刚(2010)^[14]认为,在当前有效需求尤其消费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能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和投资潜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部分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城镇化可以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结论。^{[15][16]}但由于目前中国以土地、资源推动和规模扩张为主的低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并未发生根本转变,长此以往,城镇化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不仅无法促进经济增长,还可能蜕变为经济增长的阻力。^{[17][18][19]}

因此,在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重新审视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通过实证分析为城镇化战略选择提供客观结论尤显重要。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既涉及到城乡人口迁移、生产要素集聚和与之伴随的产业结构调整,又包含资源配置、环境承载以及城市建设等内容,几乎涵盖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如何综合经济、社会等多项复合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现有研究使用的主要指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仅以人口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研究无法客观描述城镇化过程的复杂性,准确判断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需要综合考虑城镇化过程所涉及的多个方面。虽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关于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局限于省、市和县级层面,鲜有研究针对中国整体城镇化发展进行分析。^[20]其中,为数不多的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平和倪莘(2013)^[21]以及曹飞(2014)^[22]的研究,他们分别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对2010年和2004—2012年中国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但何平和倪莘的研究仅限于单一年份,缺少从时间序列角度的纵向研究,无法分析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迁特征,而曹飞的研究涵盖时间范围较为有限,既无法用于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也不能反映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的变化趋势。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研究仍十分有限,缺乏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影响关系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首先构建衡量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其次运用测算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TVP-VAR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关系的时变特征,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特别地,本文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两个方面衡量经济增长,并重点分析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影响及历史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回答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是否可以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这一问题。

一、基于因子分析的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城镇化内涵丰富,涉及到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创新等诸多层面。鉴于此,在参考现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城镇化涉及的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及创新与研发六个主要方面,并基于因子分析法,运用1996—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因子分析法不仅可以避免加权平均和专家赋权法易产生的主观性问题,也可以在信息损失量最小的情况下达到降维的目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一)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建立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及创新与研发6个方面的一级指标,并在各一级指标下选取具有代表性且数据可得的二级指标,共44个指标(表1),原始数据来自1997—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①。相关指标的具体说明如下:

表1 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A: 人口发展	A ₁ : 城镇化率	%	正向
	A ₂ : 城镇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	%	正向
	A ₃ : 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	正向
	A ₄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B: 经济发展	B ₁ : 人均GDP	元	正向
	B ₂ :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正向
	B ₃ : 人均财政收入	元	正向
	B ₄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正向
	B ₅ :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正向
	B ₆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B ₇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元	正向
	B ₈ : 居民消费水平	元	正向
	B ₉ : 对外贸易依存度	%	正向
C: 社会发展	C ₁ :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向
	C ₂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向
	C ₃ : 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生数	人	正向
	C ₄ : 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正向
	C ₅ : 教育经费占GDP比重	%	正向
	C ₆ : 每十万人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正向
	C ₇ : 万人拥有互联网用户数	人	正向
	C ₈ :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业机构数	个	正向
	C ₉ : 万人拥有文化馆(站)机构数	个	正向
	C ₁₀ : 每百人私人汽车拥有量	辆	正向
	C ₁₁ : 国内人均旅游消费	元	正向
	C ₁₂ : 万人拥有星级饭店数	个	正向
	C ₁₃ : 每十万人人口火灾发生率	起	负向
	C ₁₄ : 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	件	负向
	C ₁₅ : 城乡收入差距		负向
	C ₁₆ : 城乡消费差距		负向

^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再列出相关指标的详细说明,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D: 资源与环境	D ₁ : 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耕地面积	亩/人	正向
	D ₂ :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负向
	D ₃ :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负向
	D ₄ :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标立方米	负向
E: 基础设施	E ₁ : 城市用水普及率	%	正向
	E ₂ : 城市煤气普及率	%	正向
	E ₃ : 电话(含移动电话)普及率	%	正向
	E ₄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工具	标台	正向
	E ₅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向
	E ₆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E ₇ :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	座	正向
F: 创新与研发	F ₁ : 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	正向
	F ₂ : 万人拥有科研人员数	人	正向
	F ₃ : 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授权数	项	正向
	F ₄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GDP比重	%	正向

(二) 基于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针对城镇化包涵的六大类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得出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动趋势, 然后使用代表各类指标信息的公因子得出反映我国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数值, 共进行7次因子分析^①, 最终得到城镇化发展总水平和其涵盖的六大类指标综合水平的走势(图1和图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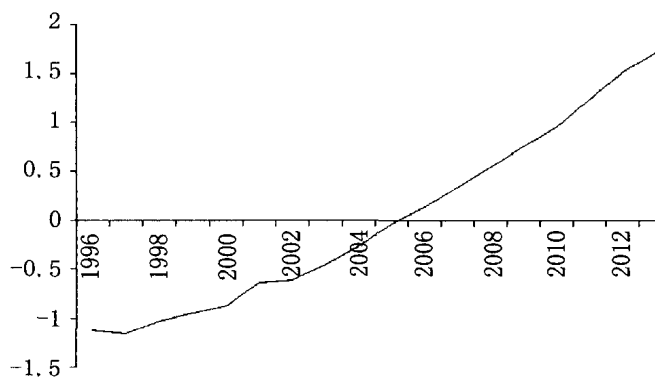


图1 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值历史走势

从图1可以看出, 1996—2013年, 我国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1995年以后, 为解决长期以来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 国家将城镇化水平设定为各省市的发展目标并纳入考核体系, 各地方政府相应制定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战略。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 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 本文得出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走势基本反映了近十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情况。

从城镇化涵盖的六大类指标来看, 各类指标变化的历史趋势存在较大的差异, 可见, 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其中, 1996—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改革开放制度红利的不断释放, 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得到解除, 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 在城市高收入回报的吸引下,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尤其在1999年之后,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束,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农业转移人口流动性增强, 出现了“民工潮”, 见图2(a)。

从城镇化的基础来看(图2(b)), 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可见, 1996年经济软

^①由于篇幅有限, 因子分析的模型介绍、过程中涉及的具体统计量检验及方差、因子载荷矩阵等不再列出, 如果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②因子分析方法得到的综合指数存在负数, 因本文主要分析城镇化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和将其用于模型构建, 数值本身并没有特殊意义, 故不对其进行平移处理。

着陆之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城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总需求尤其出口需求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因而曲线斜率出现短暂的下降。2010—2013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断放缓,但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大大强化了城镇化的基础,因而其综合水平继续提升。

从图2(c)的社会发展指标来看,除2001—2003年有短暂下降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升,表明城镇化中的社会保障在逐步完善。仅就二级指标数据而言,2001—2003年,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出现下降,而城乡收入、消费差距及每十万人人口火灾发生率均出现上升,表明在此期间我国在医疗、城乡差距及公共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影响到整体社会发展水平。

从资源与环境来看,1996—2013年我国资源与环境综合指数值呈总体下降趋势,表明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后是高消耗、高排放以及土地过度扩张的发展模式,不利于城镇化综合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其中,“九五”期间,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树立了“基本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改善部分城市环境质量”的目标,实施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得1996—1998年资源与环境指数值出现较大幅度上升;1999—2009年,随着投资扩张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和环境资源的消耗日趋加剧;2010年以后,政府再次对环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提出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加大力度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资源与环境指数值再次出现上升,见图2(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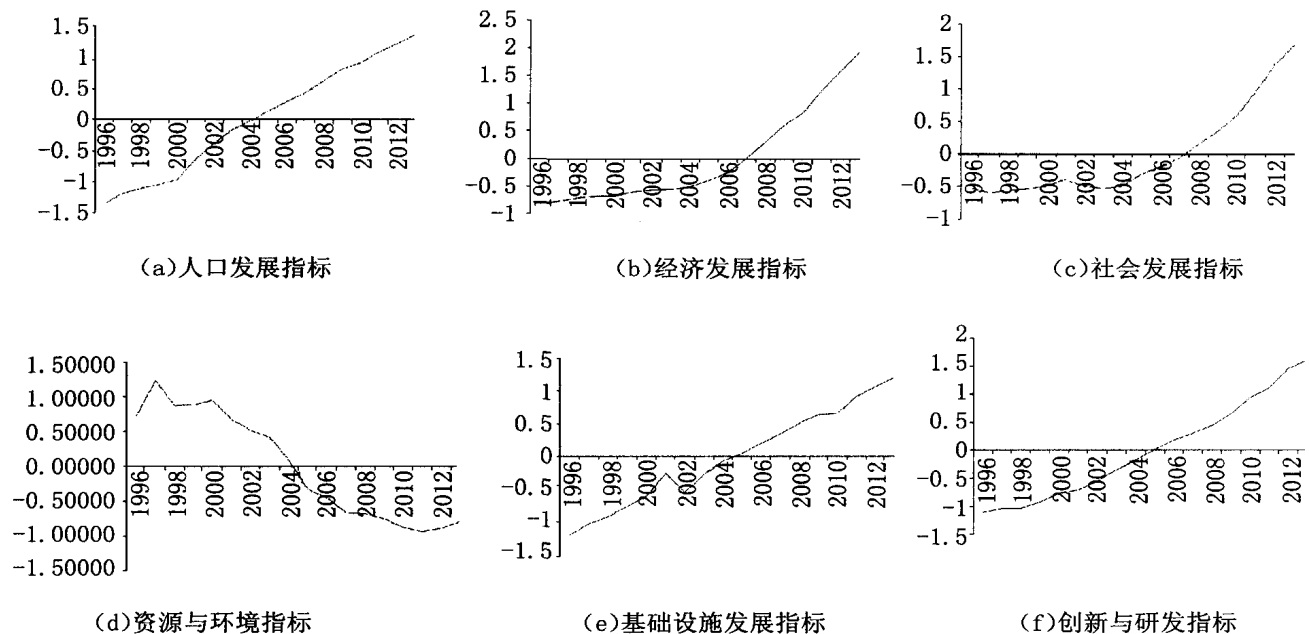


图2 城镇化涉及六大类指标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值的历史走势

图2(e)表明,在基础设施方面,除2002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外,指数值总体不断上升,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城市现代化程度仍较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不足。因此,一直以来,政府都十分重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新常态下更是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稳定总投资增长的重要着力点,未来有望继续增长,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从图2(f)所示的创新与研发方面看,1996—2013年其指数值持续上升,表明我国创新投入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这一结论也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符。内生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长期性。因此,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研发的投入和人才的培

养,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与扩散在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人口红利消失和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创新必然成为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从上述分析来看,1996—2013年中国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其动力来自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创新与研发等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对城镇化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存在长期的制约作用,坚持走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二、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分析

在分析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历史走势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建立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研究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动态影响的时变特征和规律。由于篇幅有限,关于该模型的基本形式、先验值选取和参数估计方法的详细介绍可参考Nakajima和Watanabe(2011)^[23]的研究,本文不再列出。

(一)数据选取和说明

本文选取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和城镇化发展水平三个变量构建TV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对二者影响的时变特征,样本范围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其中,以GDP增长速度反映经济增长水平,首先获得GDP季度累积绝对量和同比实际增速,以2005年为基期计算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季度累积值,进而得到其实际当季值,然后通过X12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因素,最后计算出GDP当季实际同比增长率;其次,以劳动生产率反映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①,由GDP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计算所得,其中GDP使用前述处理后得到的季度实际值,由于就业人数为年度数据,本文对其进行二次插值频率转换进而得到就业人数的季度值;再次,选取上一部分得到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数值反映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为保证数据频率的一致性,同样对其进行二次插值处理得到季度数据。为保证参与计算数据的平稳性,对以上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②,得到三组数据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因此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得到最终的计算数据。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TVP-VAR模型的时变特性,我们可以基于任何一个样本期内的时点计算脉冲响应函数,用于分析不同时期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图3是在给定城镇化发展一单位正向的冲击时,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在滞后4期、8期和12期(即1、2、3年)的时变参数脉冲响应结果。本文选择滞后4、8及12期的原因是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正向冲击的短(1年)、中(2年)、长(3年)期响应的代表,用以分析冲击的暂时性和持续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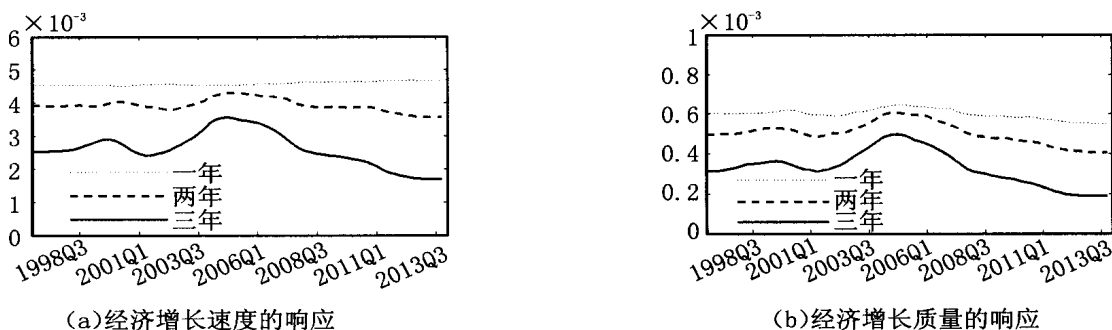


图3 基于不同滞后期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冲击的响应

①关于广义的全面的经济增长质量,现有研究没有得出统一的代表性指标,因此本文选取通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反映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

②具体检验结果本文不再赘述。

可以看出(图3(a)),城镇化发展水平冲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均显著为正,表明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保障,其增长引擎的作用毋庸置疑。其中,城镇化冲击的暂时性影响十分稳定,而中长期的持续性影响在2004年下半年达到高点以后持续减弱。根据城镇化发展的“S”型曲线可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贸易规模扩大,从因子分析得出的综合水平来看,样本期内城镇化均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因而总体上发挥了增长引擎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仍处于加速发展期,而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出现了减弱,这一现象与我国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有关,同时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制约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递减,受此影响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此城镇化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趋弱。

由图3(b)可以看出,在短、中、长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效果基本保持了一致的趋势,即对于城镇化的一单位正向冲击,经济增长质量的响应显著为正,并于2004年下半年达到峰值后持续减弱。上述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即效率的提升亦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伴随城镇化发展的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对效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继续走规模扩张的老路已难以为继,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亟需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城镇化进程中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才是推动城镇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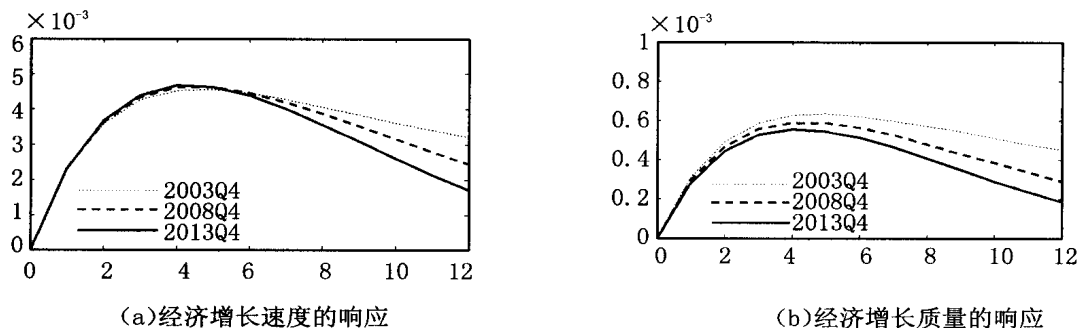


图4 基于不同时点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冲击的响应

为进一步分析在代表性时点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影响,本文绘制基于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函数(图4)。本文选取的代表性时点分别是2003年4季度、2008年4季度和2013年4季度。一方面,三个时点分别位于样本的前、中、后端,保证了分析的全面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三个时点分别代表了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金融危机时期以及经济新常态时期,便于对比新常态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作用效果与其他时期的差异性,进而回答新常态下城镇化是否可以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这一问题。

可以看出,在三个不同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对城镇化发展冲击的响应形态基本一致,即保持了持续正向的响应,并于1年后达到峰值,但在三个不同时期的作用强度表现出递减的态势。和基于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结果一致,城镇化冲击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提升既具有短期效应,又具有长期的持续效应。特别地,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提升的短期效果仍然十分明显,但是从长期看,其作用效果明显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金融危机时期。可见,新常态背景下,城镇化发展仍然可以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但是,不应该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而过分高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尤其应正视城镇化发展模式存在的弊端和人口红利消失对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三、结论和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伴随工业化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仍任重而道远。本文基于因子分析方法测算1996—2013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历史趋势,在此基础上,使用TV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影响的时变特征,并重点分析了经济新常态下其影响效果与其它时期的差异性。结合研究结果和中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首先,在1996—2013年之间,受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创新与研发等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带动,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升。但是,期间资源与环境指数不断下降,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和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为根本目标,通过继续引导农业转移人口的合理流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创新与研发的投入力度,强化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应重点解决土地资源过度扩张造成的浪费问题以及环境污染问题,走出一条“资源集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其次,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提升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自2005年以后,其促进作用不断减弱,这一结果与经典的城镇化发展“S”型理论不符。当前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但受长期以来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趋弱,与此同时,未来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继续走粗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仅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有限,而且更加难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因此应当着力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效率,合理规划发展路径和界定城市承载边界,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在人口发展方面,应当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素质和增强其技能积累为重点,应对刘易斯拐点出现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进而形成新的人口红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再次,从城市建设角度来看,城市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指标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设宜居和谐的现代化城市、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积极寻找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一方面,应当继续提升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和服务,使得信息技术覆盖城市的全部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智慧城市,同时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程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另一方面,鉴于环境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在城市建设中应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解决“脏、乱、差”等固有问题,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提高城市的宜居程度。

最后,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仍可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其带动效果不仅弱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而且弱于经济危机时期,特别从长期来看,其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减弱。因此,应着力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正视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及时转变。但即便如此,面对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的日益加大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应该过分高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而应理性认识并解决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来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参考文献:

- [1] 马晓河.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N]. 人民日报, 2011-12-07.
- [2] 郑鑫.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现实途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 (6): 4-15.
- [3] 李强, 陈雨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7): 82-100.
- [4] 孙祁祥, 王向楠, 韩文龙.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再审视——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3, (11): 20-28.

- [5] LAMPARD E E. The history of cities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area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5, (2): 81-136.
- [6] CHENERY H B, SYRQUIN M, ELKINGTON H.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1970[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7] 周一星. 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 *人口与经济*, 1982, (1): 28-33.
- [8] BLACK D, HENDERSON V. 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2): 252-284.
- [9] HENDERSON J V.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 (1): 1-28.
- [10] BERTINELLI L, BLACK D. Urbanization and growth[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4, (1): 80-96.
- [11] 王小鲁.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 (1): 23-32.
- [12] 沈坤荣, 蒋 锐. 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7, (6): 9-15.
- [13] 丁学东. 关于扩大内需的几点思考[J]. *管理世界*, 2009, (12): 1-6.
- [14] 王国刚. 城镇化: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 *经济研究*, 2010, (12): 70-81, 148.
- [15] 朱孔来, 李静静, 乐菲菲.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11, (9): 80-87.
- [16] 闫 坤, 刘陈杰. 我国“新常态”时期合理经济增速测算[J]. *财贸经济*, 2015, (1): 17-26.
- [17] 李尚蒲, 罗必良.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战略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8): 37-42.
- [18] 陈斌开, 林毅夫. 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81-102.
- [19] 齐红倩, 席旭文. 中国城镇化为何背离缩小城乡差距目标?——基于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 (4): 7-14.
- [20] 郭叶波, 魏后凯. 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述评[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3, (2): 37-43.
- [21] 何 平, 倪 苹. 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J]. *统计研究*, 2013, (6): 11-18.
- [22] 曹 飞. 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仿真与提升[J]. *财经科学*, 2014, (12): 69-78.
- [23] NAKAJIMA J and WATANABE T. Bayesian analysis of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J]. *Japanese Int. Economies*, 2011, (25): 225-245.

(收稿日期: 2015—07—13 责任编辑: 肖 磊)

Measur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the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Qi Hong-qian^{1,2}, Xi Xu-wen², Gao Qun-yuan²

(1.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 Research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2. School of Busines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Abstract: We use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es to measure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ver the 1996—2013 period, and set up an TVP-VAR Model to study the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n growth rate and quality of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ends to rise consistently, 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fra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ontinuously; and that it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crease in growth rate and quality of economy in the long term, but such effects seem to decrease after 2005, especially at the time of new economic normality. We hold that: it is improper to overvalue the pulling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minishes, and that it is critical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many areas in new economic normality, such as smart city,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etc.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TVP-VAR Model